

第三章

《麦克布莱德报告》与传播权利(1980—1998 年)

一、简介

《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全称叫作“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天与明天——走向一个更加公正与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这份报告始自 197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9 次会议,并在四年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21 次会议通过。自此之后,学界试图回顾与延续《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这些探索当中,传播批判学者的努力尤为耀眼。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三类与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相关的学术成果上。第一类学术著作直接对《麦克布莱德报告》文本进行解读。1981 年初,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召集一批传播学者,编写了第一本评论书籍:《80 年代的传播问题:〈麦克布莱德报告〉读本》(*Communication in the Eighties: A Reader on the MacBride Report*)。《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公报:大众传播学国际杂志》(*Gazet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及《Javnost 公共杂志》(*Javnost-The Public*)陆续跟上,分别在 1981 年秋、

1992年以及2005年对该报告进行了相似的回顾与解读。

第二类学术著作大都采用副标题形式来继续深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个切口,借此来表达与《麦克布莱德报告》的血脉关系。它们主要包括“很少声音,很多世界”(Few Voices, Many Worlds)^①、“更多声音,另一个世界”(Many More Voices, Another World)^②、“一个世界,很多挣扎”(One World, Many Struggles)^③以及“很多声音,一个愿景”(Many Voices, One Vision)^④。

除了这些直接纪念《麦克布莱德报告》或者间接重复该报告切口的文献之外,第三类学术著作将《麦克布莱德报告》当成一个与新秩序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来对待。如果没有谈及《麦克布莱德报告》,任何讲述新秩序的文章都是不完整的。它们在讲述新秩序运动历史时,都单独拿出大量篇幅讨论《麦克布莱德报告》。这种方式既体现于《权力的媒介》(*Agents of Power*, 1984, 1995)这本书中,又体现于《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年特刊上,既体现于《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传播与世界秩序》(*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这本书中,还体现于《全球媒介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5年特刊上。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新秩序运动的政治过程,第二章描述了新秩序运动的主导学术范式——文化帝国主义,本章将集中考察这个政治过程诞生的一个重要产物——《麦克布莱德报告》。首先,通过扼要回顾前两章的内容,本章进一步交代了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即后来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产生的政治与体制背景。然后,本章概括了前人对《麦克布莱德报告》的研究成果,并

① Michael Traber, Kaarle Nordenstreng, ed.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1992

② Richard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Hampton Press. 1998

③ Robert A. Hackett, Yuezhi Zhao, ed.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④ Philip Lee, ed. *Many Voices, One Vision: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in Practice*. Southbound Penang. 2004

重点分析了该报告脚注内容。

最后,本章论证了《麦克布莱德报告》与《民间团体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宣言》之间的关键连接概念——传播权利。《民间团体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宣言》是 21 世纪初高峰会议上诞生的重要文件;《麦克布莱德报告》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秩序运动当中诞生的重要文件。由此,本章点明了这两场全球传播治理事件之间历史承接关系。

二、背景

从大背景来看,《麦克布莱德报告》是新秩序辩论的产物,第一章讲了新秩序辩论的政治过程。更广泛来看,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体系内一共进行了四场有关媒介问题的多边辩论。新秩序辩论就是这四场辩论当中的一场。这个大背景可以列举如下:

- (1) 1920—1930 年代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组织的有关媒介与和平的讨论;
- (2) 1948 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的信息自由会议;
- (3) 1970—19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
- (4) 21 世纪初国际电信联盟负责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麦克布莱德报告》具体诞生于新秩序辩论的背景下。新秩序背景可以列举如下:

- (1) 1976 年:水酒互变的年份;
- (2) 1977—1983 年:新秩序的三个主要产物;
- (3) 1984 年:新秩序的失败。

在传播问题的多边辩论中,联合国体系(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在 1976 年进入政治僵局。东、西、南三方在传播问题上各执牛耳,互不相

让。各方在《大众媒介宣言》草案上存在实质性分歧。成立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是一种试图打破这种僵局的尝试。第一章将 1976 年定义为水酒互变的一年,以此显示这一年的重要性。这主要是《麦克布莱德报告》诞生的大背景。在简单回顾了这个大背景之后,本章主要想要着重介绍该报告产生的体制背景,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处理大众媒介问题上的经历。

1976 年,各方力量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色产生了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究竟有没有资格制定媒介行为规范?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来看,这个国际多边组织完全有责任促进各国在大众媒介问题上的讨论,并制定有利于促进和平的媒介行为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开篇写道:因为战争起源于人的心灵,所以应该在人的心灵中构建和平的保障。该宪章第一条具体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利用各种大众传播手段,促进文字与图像在世界的自由流通,以此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因此,从成文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权设定大众媒介行为准则的。

但是,从案例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缺少在大众媒介问题上制定行为规范的先例。根据联合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早期分工,应该由联合国大会制定有关大众媒介的行为规范,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下属组织只负责落实具体的技术问题,譬如技术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的第一个大众媒介项目就是技术援助项目。195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有关全球“信息饥荒”的报告。根据此报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定,要求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COSOC)设计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传播与信息媒介发展项目。1962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到该项目中来。通过这个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换了角色,将自己变为“讨论信息问题的论坛”。^①

在这个项目之后,一切变得顺理成章。在联合国教科文这个多边组织讨论大众媒介问题既有了案例,也有了法理上的依据。发展中国家很快意识

^① Cees Hamelink. MacBride with Hindsight. In: Peter Golding, Philip Harris, ed.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1997. 72

到,技术援助项目并不能改变他们在信息领域的落后现状。这些国家发现,它们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济、文化上仍然处于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这种情况是殖民关系的延续。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些国家积攒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开始在多边组织中挑战旧的世界传播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论坛。

197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上,东、西、南三方在《大众媒介宣言》草案上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一些国家也开始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个组织在大众媒介问题上走得太远,由运动员转变成了裁判员。在这个体制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在世界各地推贤举能,讨论国际传播问题。成立这个委员会,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一个脱身之计。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以缓解当时风起云涌的反帝势头。对于不结盟运动国家来说也不是坏事,他们处于攻势,正在试探自己的实力,计算交易的筹码,并不想让大众媒介问题上的讨论陷入僵局。实际上,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操作。通过这种操作,各国可以避免在《大众媒介宣言》草案上进行殊死搏斗,而可以颇有面子地再等四年,观察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研究结果。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大众媒介宣言》。《大众媒介宣言》获得通过两年后,《麦克布莱德报告》也获得通过。

三、《麦克布莱德报告》及其早期评论

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构成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该委员会由16个成员组成。其中六个来自第一世界,两个来自第二世界,八个来自第三世界。这些成员的工作背景大都融合了政治家、记者、学者这三种身份。委员会最后递交了16贤人达成一致的报告。他们之间意见分歧分散地

体现在该报告 36 条脚注上。如果某个成员对某个观点持有异议，就将自己的意见以脚注形式表达出来。分析这些意见——尤其是苏联代表洛谢夫 (Sergei Losev)、加拿大代表齐默尔曼 (Betty Zimmerman) 以及美国代表埃布尔 (Elie Abel) 的意见——有助于理解各方的意识形态分歧。

委员会建议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社区电台，这种电台在 25 个欧美国家普遍存在。对于这一条建议，苏联代表洛谢夫提出异议，认为建立社区电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刚刚开始建立自身传播系统。他认为应该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国家电台，然后向公民配送收音机。^① 洛谢夫的意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但是，必须同时注意到，虽然洛谢夫的意见更加实事求是，但是洛谢夫在报告的其他部分却在为政府控制媒介甚至审查制辩护，这带着明显的苏联意识形态烙印。例如，当委员会建议应该强烈谴责信息审查、控制行为时，洛谢夫却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置于国家主权的框架下思考与解决。^②

委员会担心，市场机制下的媒介在设计节目时总是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这会导致节目质量的降低。对于这个观点，加拿大代表齐默尔曼表示质疑。她认为委员会的观点打击面太大，以偏概全。她指出，公共广播电视中的很多节目是为一些少数群体服务的。^③ 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委员会担心大众媒介在散布恐惧与暴力方面的后果，因此建议媒介的魔力应该被用于相反的方向——构筑和平与共识。“如果媒介有能力去散布恐惧，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利用这种能力去将人们从恐惧与猜忌当中解放出来，坚决反对各种暴力与战争行为，反对国际关系当中诉诸武力的行为？”

对于委员会的这种诉求，齐默尔曼提出了质疑。她拒绝从“利用媒介干

①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88

②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266

③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153

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利用”一词违背了媒介自由的理念。^① 齐默尔曼的这种观点暗含了一种逻辑,即市场条件下的媒介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的摆布与利用。齐默尔曼的这种天真观点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当中很具有代表性。那时还缺乏对媒介自由的普遍反思,认为市场条件下的媒介自由代表了真正的媒介自由。这也是新秩序辩论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权力的代言人》中,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点名反驳了齐默尔曼的这种天真观点。阿特休尔指出,媒介自始至终都是被个人以及权力群体利用的,任何体制之中的媒介都是权力的代言人。“新闻媒介是威力强大的工具,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是这种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被谁使用的。”^②在评价新闻从业准则与媒介所有权时,美国代表埃布尔跟齐默尔曼的立场相似。委员会认为虽然存在两种本质不同的新闻观并且当前难以形成一致的新闻从业准则,但是并不能因此放弃建立统一新闻从业准则的努力。埃布尔反对现在以及将来建立新闻从业准则,认为不可能存在某种准则,既能兼容政治控制下的媒介体制,又能兼容独立、质疑的媒介体制。埃布尔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市场媒介体制辩护,认为应该将媒介完全置于市场逻辑之下。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委员会建议限制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与垄断。埃布尔对此不表赞同,认为在某些国家中,媒介本身就是在国家垄断下建立的,并且为某个政党服务。^③

苏联、加拿大、美国代表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表明,《麦克布莱德报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寻求妥协的政治与外交行为,而非一种寻求真相的学术与科学分析。该报告刚一发表,就引来一轮学术争鸣。1981 年,哈梅林

①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177

② Herbert J.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Longman. 1984. 440

③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266

克(Cees Hamelink)召集了九个国家的九个学者,出版了第一本针对《麦克布莱德报告》的评论集。1982年,这些评论被收录于《大众传播评论年鉴》。九个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麦克布莱德报告》进行了批判分析。尼日利亚学者奥普波(Alfred Opubor)认为该报告缺少理论视角。“虽然这份报告有助于门外汉理解国家传播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寻求新理论、新视角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①

芬兰学者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认为该报告缺乏历史视角。“该报告孤立地看待传播历史,其使用的范式没有将传播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有机地整合起来,因此是一种功能—实证主义的方法。”^②诺登斯顿还认为,该报告并没有论证出来标题中所说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③匈牙利学者赛斯科(Tamas Szecsko)认为该报告对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问题缺乏认识,并认为该报告对传播技术的认识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④委内瑞拉学者卡布瑞尔斯(Oswaldo Capriles)指出该报告没有清晰地界定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内涵。^⑤黎巴嫩学者达贾尼(Nabil H. Dajani)发现该报告过于强调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国家之间的信息流通,较少强调精神层面价值观以及贫富之间的信息流通。^⑥

印度学者伊本(Eapen K. Eapen)认为该报告描述了不少问题,却很少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即过于强调什么(what)、什么时间(when)、什么地点

① Alfred Opubor. In: Cees Hamelink. *Communication in the Eighties: A Reader on the MacBride Report*. Rome: IDOC International. 1981.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36

② Kaarle Nordenstreng.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41

③ Kaarle Nordenstreng.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48

④ Tamas Szecsko.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51

⑤ Oswaldo Capriles.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57-259

⑥ Nabil H. Dajani.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61

(where)、什么人(who),而较少阐释什么解决方法(how)。^① 德国学者贝克尔(Jorg Becker)认为该报告作者并没有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媒介技术与媒介内容之间的关系。^② 荷兰学者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认为该报告对于“跨国公司拥有的无所不及的政治经济权力”缺乏足够的认识与批判。^③ 美国学者席勒(Herbert Schiller)观察到,该报告没有分析传播技术造成的结构性问题。^④

这些对《麦克布莱德报告》的早期解读偏于负面。显然,这些负面解读确实是《麦克布莱德报告》本身存在的缺陷,不过现在看来未免苛刻。在这里,应该结合 1981 年的具体时代情境去认识这些负面解读。1981 年,新秩序辩论的结果仍然存在很多可能性。上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会议(第 21 次全体会议)除了批准《麦克布莱德报告》之外,还批准了委内瑞拉提出的一项决议。该决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马上采取措施,进行新的研究,来界定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并商讨建立新秩序宣言的可能性”。^⑤ 1981 年 5 月,为了表示对《麦克布莱德报告》以及委内瑞拉决议的反对,在产业界的支持下,第一世界记者在法国特里艾召开会议,并通过《特里艾宣言》,对抗新秩序运动。

上述对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九个解读写于贝尔格莱德会议与特里艾会议之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新秩序运动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些负面解读有助于更全面、更完整地认识新秩序。后来——尤其在 1984 年美国

① Eapen K. Eapen.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67

② Jorg Becker.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69

③ Cees Hamelink.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76

④ Herbert Schiller. Reproduced in Whitney, Charles, and Sven,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2. Volume 3. 283-287

⑤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Hampton Press. 1999. 252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从官方重新界定新秩序的含义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这时,人们在总结新秩序运动时才发现,《麦克布莱德报告》是最重要的遗产。跟其他两份遗产《大众媒介宣言》、发展传播国际项目相比,《麦克布莱德报告》更像是新秩序运动成果的结晶。《大众媒介宣言》沦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背后的政治过程比宣言本身更具价值。发展传播国际项目则是一件返祖产品,西方国家成功地用狸猫换了太子,传播结构问题再次被置换成一个技术援助平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布莱德报告》成为国际传播史上的里程碑。该报告并非在出版之后就马上变成了里程碑,而是在新秩序运动失败之后才达到这个高度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这个报告总结了新秩序运动之前以及之中的国际传播研究成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它是跨越了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的分歧。没有人能够否认该报告体现的“求同存异”精神以及“集大成”特点。这份报告最具创新意义的部分是其对传播民主化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传播权利被当作一项基本人权提出来,并被用于整合其他权利:民主社会的传播需求应该包括一些具体衍生权利,如知情权、告知权、隐私权以及公共讨论参与权。传播权利是个整合概念,可以概括所有这些要素。在开发新时代的社会权利时,建议积极探索传播权利的具体含义。^①

四、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与传播权利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期计划,埋葬了新秩序。这标志着在新秩序、《麦克布莱德报告》方面的官方讨论彻底结束。^②新秩序辩论主要是由东、西、南三方国家主导的辩论,缺少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这意味着,当美英退出该辩论的主要论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

^① Sean MacBride et al.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UNESCO. 1980. 265

^② Kleinwachter 在 1993 年, Nordenstreng 在 2005 年, Siachru 在 2005 年分别提到这一点。

新秩序运动就必然会走向失败。^① 美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新秩序这个概念成为禁忌。由于新秩序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也差点陷入瘫痪。

本来,联合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经赞助了两次新秩序圆桌会议,继续讨论新秩序当中的问题,但是到了 80 年代末期,这些组织开始有意划清自己跟新秩序的界限,停止赞助新秩序圆桌会议。在这个背景下,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召开。通过这个非政府平台,新秩序运动当中学术力量与 21 世纪初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当中的民间团体连接起来。在高峰会议上,尽管政府与市场力量处于自身整体利益的考虑,不愿面对新秩序运动这段历史,但是民间团体却百无禁忌,认真对待从新秩序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历史承接关系。

传播批判学者通过参与新秩序运动的政治辩论得出一个沉痛教训:要尽可能广泛地深入到草根力量中去,要最大限度地独立于政治力量。组织一支独立力量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方面,传播批判学者发现,虽然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但是这些国家当中的精英阶级对于增进本国民主并不感兴趣,精英阶级似乎更想控制媒介,而非解放媒介。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市场意识形态充分释放出来,进一步增加了实现传播民主化的障碍。传播批判学者发现,他们必须学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针对全球背景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另一个拳头针对某些国家背景中的集权主义。作为民间团体的代表力量,非政府组织成为这些传播批判学者最心仪的合作对象。从 1989 年到 1999 年每年召开一次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为这些民间团体提供一个持久的交流平台。

1989 年 10 月,第一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南非记者协会(Federation of Southern African Journalists)、国际记者协会

^① Sean O SioChru. Finding a Frame;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Advocacy Campaign to Democratize Communication. In: Robert Hackett, Yuezhi Zhao, ed.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29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Journalists) 以及不结盟国家媒介基金会 (Media Foundation of the Non-Aligned) 联合召开了这次会议。在《麦克布莱德报告》出版十周年之际, 此次会议重新评估了国际传播的现状, 并且达成共识: 整合现有国际资源, 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网络, 促进有关新秩序的对话。^① 南斯拉夫学者斯布利豪 (Slavko Splichal) 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观察到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 政府力量的缺席以及民间团体的参与 (18 个非政府组织)。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批判学者还包括诺登斯顿 (Kaarle Nordenstreng)、哈梅林克 (Cees Hamelink)、默拉那 (Hamid Mowlana)、特拉伯 (Michael Traber) 等人。^②

第一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只是笼统地强调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 第二次与第三次圆桌会议具体指明需要非政府力量在哪些方面进行参与。1990 年 9 月, 第二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此次会议提倡传播当中的女性问题以及女性视角。^③ 1991 年 6 月, 第三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此次会议强调传播权利概念的重要性, 呼吁媒介专业人士、社会活动家、消费者团体、女性团体以及宗教、劳工、环保等团体之间加强合作, 建立联盟。同时, 这次圆桌会议还注意到“国家与世界文化的集中化、同质化、商业化以及军事化”, 认为“跨国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信息与娱乐产品的选择、制作以及销售”, 这背离了《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倡的原则。^④

第三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之后, 基督教国际传播协会出版了《很少声音, 许多世界》, 回顾了《麦克布莱德报告》之后的国际传播概况。^⑤ 此书编辑

① 哈拉雷, 1989 年 10 月 29 日。

② Slavko Splichal. NIICO-dead or alive? MacBride Round Table on Communication in Harare, 27-9 October 1989. In: Colin Sparks, Colleen Roach, ed.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90. 400

③ 布拉格, 1990 年 9 月 22 日。

④ 伊斯坦布尔, 1991 年 6 月 21 日。

⑤ Michael Traber, Kaarle Nordenstreng, ed.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1992

特拉伯(Michael Traber)与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提出了开展游说活动的新框架:媒介改革运动。这个框架简单、明确,可以整合国际与国内两个背景。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传播权利框架的可行性。此时,特拉伯与诺登斯顿已经认识到新秩序讨论已经完全由官方转移到了学界,需要鼓励相关个人与非政府组织,关注《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的问题。

根据前三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的成果,特拉伯与诺登斯顿将民间团体定义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相关组织与个体应该团结一致,参与大众媒介问题的决策过程,防止政府以及少数强大而贪婪的跨国公司垄断这个过程。”^①1992年8月,第四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传播批判学者使用“传播权利”与“媒介改革运动”两个框架来定义他们的游说活动。“民间团体”一词首次出现在圆桌会议的记录当中。会议阐明,民间团体这个概念包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并非某个国家政府赋予他们的,而是普世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在民间团体这个概念下,“传播权利”应该被视作公民——作为民间团体的成员——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媒介改革运动”应该被视作各种社会运动当中的一种,跟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一样,媒介改革运动位于民间团体的核心。^②

1994年1月,第六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在美国檀香山召开。媒介改革运动框架并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当中,传播权利成为主导框架。在这次会议之前召开的太平洋电信委员会(the Pacific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第16次会议上,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出于对这次会议的回答,第六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表达了对这一计划的担忧,认为在这个远景技术方案下,贫穷地区将难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不管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差距有可能发展到不可弥合的地步。”

① Michael Traber, Kaarle Nordenstreng, ed.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1992. 1-2

② 圣保罗,1992年8月21日。

虽然那时数字鸿沟这个词尚未出现,但是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对数字鸿沟的担忧。^①第七次与第八次圆桌会议分别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非洲与信息高速公路)^②与韩国首都汉城(现首尔)(传播与文化:身份、多样性与平等)^③召开。第九次圆桌会议召开于美国博尔德,会议总结了20世纪末的两个历史趋势:私有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大,权力逐渐从政府向民间团体转移。^④第十次(最后一次)圆桌会议召开于约旦首都安曼,会议的主题为“文化与传播:全球信息社会”。^⑤

这十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大致带有下面三个特点。第一,圆桌会议的参与者逐渐接受并推崇传播权利框架。第二,圆桌会议的主题逐渐扩展,从批判媒介所有权开始,后来涉及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批判。第三,圆桌会议的行动方案日益走向草根力量,并依赖他们构建全球民间团体的大团结。同一批传播批判学者除了在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这个平台聚集之外,还参加或者创建了其他交流平台。荷兰的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起草了人民传播宪章;芬兰的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启动了国际媒介监督项目;美国的格伯纳(George Gerbner)发起了文化环境运动。

在英国伦敦,一些非政府组织共同搭建了传播权利平台(the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实际上,在1997年第八次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之前,传播批判学者已经参与到传播权利平台中。到了2000年10月,这个组织决定参与高峰会议,那时联合国刚刚做出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决定。2001年,传播权利平台开始开展信息社会传播权利运动(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这样,新秩序辩论当中的学术力量下潜到民间团体当中。这里的活动家除了上面提及的三位学者之外,还有文森特(Richard Vincent)、赛欧楚(Sean O Siochru)、麦克切斯尼(Robert Mc-

① 檀香山,1994年1月20~23日。

② 突尼斯,1995年3月16~18日。

③ 汉城,1996年8月24~27日。

④ 博尔德,1997年10月1~2日。

⑤ 安曼,1998年11月23~25日。

Chesney)等人。

一些传播学者忙于以传播权利为框架开展一系列游说活动;另一些学者则回顾历史,探索传播权利框架的哲学与史学基础。斯布利豪(Slavko Splichal)所著的《公共性与新闻自由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在这本书中,斯布利豪主要讨论了“公共性”与“新闻自由”的源头,以此搜寻被历史折断的链条,界定这两个概念被曲解的时间点,并利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传播权利。传播权利概念具体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将之定义为实现传播民主化的一个主导框架。

斯布利豪进一步寻找历史的沉钩,使用康德(Immanuel Kant)的思想来看待传播权利概念,认为传播权利可以从康德的公共性观念中推导出来。在确定了传播权利概念的哲学基础之后,斯布利豪建立了出版自由体制当中的传播权利模型,将之作为代议制模型与媒介自由模型的替代模型。这是《公共性与新闻自由的原则》一书想要传达的关键信息。

通过分析康德、罗素等人的哲学思想,斯布利豪认为传播权利模型应该成为其他两种模型的替代方案。斯布利豪并没有主张应该废除新闻自由模型当中的财产权,但他的确认为出版权(推理出传播权利模型)应该高于财产权。在国际传播大背景中,代议制模型(以苏联为代表)遭遇挫折,市场逻辑下的新闻自由模型(以美国为代表)风头正劲,甚至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传播权利模型主要代表着对新闻自由模型的发展与批判。斯布利豪并没有详细论述代议制模型,也没有论证能否实现从代议制模型向传播权利模型的蛙跳,而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闻自由模型。

结合分析斯布利豪界定出来的这些模型与《麦克布莱德报告》的第四部分(传播民主化),可以得到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结果。《麦克布莱德报告》将“信息审查、控制”与“媒介所有权集中”列为实践公民传播权利的障碍,因而提出了下列传播民主化建议:

- 1) 应该废除对信息的审查与随意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

^① Slavko Splichal. *Principles of Publicity and Press Freedo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进行一些信息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有法律层面的解释,接受司法审查,并且符合《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社会通过的其他条约。

2) 应该关注公共或私有媒介所有权集中所带来的问题,关注市场对报业与广播电视的影响,关注商业或政府广告的影响。应该批判分析媒介运行的经济体制,采取措施保证独立编辑方针。

3) 应该采取有效法律措施:(1)限制集中化与垄断化过程;(2)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要求它们遵守国家立法或发展政策中的具体规定……^①

斯布利豪提倡的传播权利模型为这些传播民主化建议提供了哲学高度的解释。在苏联政府控制模型与美国市场控制模型之外,传播权利模型提出了新的媒介设计方案。前两个模型在特定历史阶段曾经进入对峙胶着状态。《麦克布莱德报告》当中,苏联代表洛谢夫为政府审查的辩护与美国代表埃布为媒介所有权的辩护就是这种状态的明证。因此,斯布利豪模型可以理解为对《麦克布莱德报告》的一种理论提升。

21 世纪初,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分两期在日内瓦与突尼斯召开,并且产生了四个主要官方文件——《日内瓦原则宣言》《日内瓦行动计划》《突尼斯承诺》《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以及两个民间团体文件——《民间团体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宣言》《民间团体声明》。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官方文件、民间团体文件分别与《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建议相比较,结果发现,民间团体文件比官方文件更符合《麦克布莱德报告》精神。例如,民间团体文件与《麦克布莱德报告》均对媒介所有权的集中表示担忧,而峰会官方文件对此只字未提。^② 这表明峰会上的民间团体更好地传承了新秩序辩论的遗产,并体现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辩论与新秩序辩论的对接。

① Slavko Splichal. *Principles of Publicity and Press Freedo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266

② Claudia Padovani. Debating Communication Imbalances from the MacBride Report to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Analysis of a Changing Discours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5. Volume 1(3)